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的 《纽约时报》^①

阎瑾^{1,2},熊沛彪¹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中日冲突的两起标志性重大事件,引起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的关注。在这两次事变期间,《纽约时报》对中日冲突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的态度由冷眼旁观转变为日益同情;对日本的态度由纵容妥协转变为批评谴责。《纽约时报》关于中日冲突的报道逐渐向抑日援华的方向转换,为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奠定了舆论基础。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纽约时报》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1-0166-08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远东政策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美国对日本侵华野心及最终将危及自身安全认识不足,因此对日采取了纵容妥协的态度。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步伐大大加快,美国在华利益不断受到威胁和挑战,促使美国远东政策从一味对日妥协变为既有妥协又有制约的双重政策。这一时期的政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学界已经做过极大努力,但关于该时期美国媒体对中日冲突的立场及与政府的互动,依然缺乏详实的研究。国外一些有关中国或日本形象的著作中对这一主题有所涉及,但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描述了从1931年到1949年美国人眼中中国和日本的形象变化^①。国内学者如张炜^②、李莉等则偏重于从新闻学角度分析某一报刊或某一记者对于中日冲突的报道,其深度和广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美国远东政策展开及转变过程中,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

体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九一八事变时期《纽约时报》主要通过所谓客观中立报道,迎合美国政府对局势的判断,化解民众疑虑,为纵容妥协政策张目;七七事变时期《纽约时报》则通过高密度报道制造舆论,帮助美国政府和民众逐步认清日本侵华行为的真相和野心,推动出台对日强硬政策。

一 《纽约时报》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无疑是美国。在美国,大众传媒一向被视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媒体扮演的微妙角色及其影响力值得研究。而在20世纪30年代,电视尚未普及,发挥重要影响的媒体无疑就是报刊,其中《纽约时报》是个中翘楚。《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其订户遍布全美甚至全世界,是20世纪以来西方最具公信力、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有

① 收稿日期:2017-05-1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WLH02);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7B017)

作者简介:阎瑾(1978-),女,山西平遥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

①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张炜:《〈泰晤士报〉与九·一八事变——一种新闻报道的构架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档案记录报”的美称^①。

美国的外交决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社会各界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觑。媒体既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参与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政府的制约。具体来说,媒体可以通过“信息来源”功能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议程设置”功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进程及走向,“舆论引导”功能推动或阻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政府也需要控制和利用媒体。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制衡的共生关系,共同维护国家利益。

首先,不仅美国民众要通过媒体来获知国内外的重要信息,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也将媒体当作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媒体会在第一时间把全球正在发生的大事传递给决策者们,同时还会为他们详尽地提供相关的国际舆论以及各方对事件的反应。这一点正符合美国政府的全球外交战略的需要。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说:“看《纽约时报》国际要闻是我们每天要干的第一件事,没有《纽约时报》,在国务院就别想工作。”^②在外事官员眼里,媒体报道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提交的报告。他们认为,“我们在看媒体报道时比看我们使馆的报告还要仔细,因为媒体比我们更容易接触这些国家”^③。

再则,媒体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管道,不仅起到信息提供者、政策解释者的作用,还会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即通过持续性报道,让某些人和事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舆论中心,制造公众参与氛围,使之对其广泛讨论、评价甚至行动,进而对政府的现行政策起到强化或改变的作用。有美国学者断言,“《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条中有90%会成为国会首先研究的问题”^④。

最后,《纽约时报》在其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是平面媒体的先锋,对美国及世界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种双向干预作用更为明

显:媒体通过向公众发布消息、评论,影响公众甚至政府官员对某些事件的判断,进而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决策者通过各种手段引导、控制舆论甚至主动制造舆论,使民众产生共鸣,广泛理解、肯定并配合政府的行动,形成良好的政治气候,以利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节点性事件,也是日本企图冲击华盛顿体系、打破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均势的一个重大标志。七七事变则意味着日本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行动,中国从此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这一时期的《纽约时报》对远东局势的变化给予了极大关注。有调查表明:国际舆论上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整个30年代的中国报道绝大部分来源于《纽约时报》,与其他媒体相比,《纽约时报》给予了中国更高的关注度^⑤。而这个时期正好是近代中国形象生成的关键时期,正是由于《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高频度地报道有关中日战争的新闻,才使得“危机中国”的形象深刻植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观念中,导致美国公众越来越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越来越支持美国政府在远东问题上使用物质力量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因此,梳理、分析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中国报道,对研究西方媒介建构中国近代形象乃至塑造美国式“中国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二 九一八事变时期《纽约时报》的态度变化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东北军为之,以此为由炮轰其沈阳北大营驻地,并于当晚攻占了整个沈阳,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与之相对应的是,《纽约时报》对中日关系报道的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1931~1932年,即九一

①Ralph B. Levering. *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18-1978. New York: Morrow, 1978.

②顾耀铭:《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③顾耀铭:《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④刘勇:《大追寻:美国媒体前沿报告》,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⑤Stephen R. Mackinnon,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127-128.

八事变前后,其中1931年216篇,1932年420篇。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但报道高峰却出现于1932年,有一个滞后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事件初期,其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事件性质的认识也有分歧,媒体关注有限。之后围绕事件的善后处理及其演变,美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包括推动国联调查、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等,媒体才逐渐予以重视。通过对《纽约时报》对九一八事变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该报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事不关己、冷眼旁观,到同情中国,再到谴责日本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态度逐步明朗,立场逐步坚定。

在事变初期,即从事变爆发到10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前,《纽约时报》还未对日军行动的性质产生清醒的认识,在貌似中立的报道中实有偏袒日本之嫌。该报发表有关方面的观点,认为日本对东北铁路等相关地区的占领,仅仅是受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中国主权并不构成侵犯。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报道,很少引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谈话,而是大量采信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声明等。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引述日方人士的说法,必然会强化对中国时局的消极看法和判断,如驻日记者修·拜厄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报道中称:“东京方面表示这是关东军在遭受袭击后的自卫行为,日本文职官员对此表示震惊并宣称此次行动未经许可。内阁表示不会将沈阳作为谈判筹码,而且会敦促军队撤军。”^①拜厄斯的报道给美国民众这样的印象: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更像是自卫行为,而且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这无疑会混淆是非,导致舆论普遍认为,“满洲问题”的导火索就是中国不履行条约的行为,并把中国反日运动视为不稳定的“危险”因素来加以对待。

在1931年9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纽约时报》将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定义为“示威游行”,用了“煽动性的”(inflammatory)和“歇斯底里的”

(hysterical)等词汇暗示了中国反日运动对正常秩序的挑战和潜在的危险性,而且指出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大因素。相反,报道中由日本管理的东北地区不仅秩序井然,而且还颇具成效^②,报道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纽约时报》在事变初期的这种报道倾向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首先,关于中日冲突的报道深受日本官方消息的影响。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外务省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引导外国媒体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报道,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③。其次,此时的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对局势产生了误判。美国政府认为,此次事件不外乎与之前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一样是经常发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并非两国政府的冲突,而是他们下属之间的对抗。日本军方只不过想借此寻衅勒索,扩大自己在满洲的利益,而这并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和利益。政府的态度温和,听之任之,媒体也紧随其后,未认识到九一八事变隐含着日本对华实施的巨大阴谋。第三,媒体的报道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制约。在事变初期,美国政府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不愿过度刺激日本,寄希望于日本文官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以期事态能自行解决。国务卿史汀生更是告诫美国新闻界,要小心慎重,不要在报刊上登载可能激起美日两国对抗情绪的文章^④。最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对美国产生很大冲击,朝野上下疲于应对,加上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民众对参与国际事务缺乏兴趣。所以《纽约时报》对中日争端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并不足为奇。

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引起的舆论反过来也对美国政府的 attitude 造成了一定影响。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9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国务院收到的电报来看,这次事件显然是派驻沈阳的日本政府代表未能有效约束日方士兵的行为引起的。它并不构成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冲突,只是发生在下层人员之间的纠纷,因此

①Hugh Byas. *Japanese Seize Mukden In Battle With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s*, 1931-09-19(1).

②Hugh Byas. *Protests Sweep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1931-09-22(9).

③Dorothy Borg, Shumpei Okamoto. *Pearl Harbor as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511-513.

④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6. P35.

不涉及《非战公约》和任何其他国际公约^①。可见在这一阶段,政府与媒体对事件性质的认识和判断都存在偏差,因而采取了完全袖手旁观的态度:既没有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中国的反应也非常冷淡。

而后的事态发展却表明,美国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日本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了侵略。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开始轰炸锦州,锦州是当时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所在地,也是通往关内的门户。一旦锦州被日本控制,英美等西方列强在华北地区的利益将受到直接威胁。轰炸锦州事件发生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媒体也一改隔岸观火的态度,对中国所处境况的同情心理明显上升,纷纷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制止日本向南扩大侵略。

在1931年12月23日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已将中日发生的军事冲突定义为“国家战争”(state of war),暗示了中日矛盾的严重性,尽管当时中日两国还未正式宣战。主标题是“日军继续大举进攻满洲”,四个副标题分别是“南京内阁整体辞职”;“蒋(介石)到乡下躲避,部分政府官员弃职”;“广州领导人欣喜”;“虽然争执的谣言四起,但估计会迅速组建新政府”^②。主副标题通过由上向下的倒金字塔和相关性控制的结构组织方式,共同勾勒出了当时中国内政外交上的危机局面。

《纽约时报》首席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发表于1932年1月1日的评论《日本旨在占领满洲》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认为日本在大连的行为已经表明其目的就是要将整个满洲据为己有,而美国和其他列强却还在袖手旁观^③。显然,阿班对美国政府迟迟没有采取援华措施感到十分无奈。

1932年1月日本占领锦州之后,美国国务卿

史汀生发表了“不承认主义”声明,明确表示美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所得。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所发表的最强硬的声明。“不承认主义”得到了美国舆论的热烈追捧,《纽约时报》也撰文称“不承认主义”使“凯洛格-百里安公约”(即《非战公约》)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④。

由此可见,从日军轰炸锦州开始到一二八事变这段时期,媒体的情感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对日本的批评逐渐增多,这明显地与事变爆发初期的等待观望态度已有所不同。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其一,轰炸锦州是一战以来首次出动空军轰炸一个和平城市,史汀生为此向日本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措辞强硬,指出:“即使在战争期间,对一个不设防的、未受警告的城市空袭也是军事行动中的极端行为。”^⑤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说,媒体对此不能不予以谴责。其二,日军并没有遵守承诺退兵,反而继续扩大侵略,这与事变之初日本提出的“自卫”和“不扩大”的说法相矛盾,日本的行动完全超出了美国原来所设想的框架。在得到日本轰炸锦州的新闻之后,史汀生自事变以来首次会见了中国驻美国代办容揆,首次听取来自中国方面的直接报告^⑥。史汀生还警告日本,美国必须保留一切行动的权利。可见,此时美国政府和媒体都开始意识到日本是想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中国东北的门户面临着被日本全面关闭的风险,因此对日本的态度都开始逐渐强硬起来。其三,1931年12月11日,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美国寄希望于日本文官政府掌控国内政局进而和平化解中日危机的设想流产。史汀生称:“我们在过去三个月的政策一直是基于日本内部行动的愿望,这个愿望现在已逐渐消失了。”^⑦政府这样不乐观,媒体对中国局势的担忧情绪也必定明显上升。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Far East*: 1931.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id=FRUS.FRUS1931v03>.

② Hallett Abend. *Wide Japanese drive continues in Manchuria*. *The New York Times*, 1931-12-23(13).

③ Hallett Abend. *Japanese admit aim to hold Manchuria*. *The New York Times*, 1932-01-01(19).

④ Hamilton Fish. *Japan Alone*. *The New York Times*, 1932-01-09(8).

⑤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第1卷》,张玮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页。

⑥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第1卷》,张玮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⑦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6. P88.

媒体报道的转向以及随之而起的舆论浪潮也对政府的态度产生了影响。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表示,美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和情绪正在升温^①。他认为公众舆论在美国非常重要,警告日本必须在中国有所收敛,否则必将激起美国公众对日本的反感。在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史汀生召见日本大使出渊时曾警告说:“美国保留让公众知道全部真相的权利,我们随时有可能公开事变以来美日之间一直保密的政府往来文件。尽管迄今为止,我一直劝告我们的媒体保持克制,不要公布任何可能激起美国反日情绪的消息。”^②他认为日本军队已经失控,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谈判,公布真相,然后等待公众舆论的反应,美国公众的反应一定是压倒一切地反对日本”^③。这里深刻地反映出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媒体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制约,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政府可能会引导媒体报道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封锁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塑造和引导舆论,对政府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使其朝着与公众舆论一致的方向发展。

然而“不承认主义”依然未能遏制日本侵华的势头。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军队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一·二八事变”。上海是列强利益最集中的城市,美国在此有着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事变发生后三天时间里,《纽约时报》不仅每天都在头版头条发布最新消息,还组织了有关的社论和分析文章,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的浪潮。在发表于1932年1月31日的《日本正在扩大利益范围》这篇评论中,《纽约时报》就尖锐地指出:“如果日本控制热河的野心像现在控制大部分满洲一样能实现的话,那么京津地区从军事意义上也会完全被日本控制。”^④这说明《纽约时报》对日本意图侵占中国北部的巨大野心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意在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完全控制中国东北。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侵华的危害性逐渐成为《纽约时报》评论的重点,其评论侧重于从全局分析日本的侵华战略计划,尤其是外交关系引起的政策演变、军事部署与进程等,如“种种事实都可以证明日方的独裁权力:满洲国的日本顾问已达六百多人,政府机构也由日本雇员所控制,日本翻译主导了所有官方会谈”^⑤、“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政策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其军事上的调动已经证明,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撼动俄国人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⑥。在《纽约时报》看来,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已经包涵着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考量。另一篇评论《日本在长城下屯兵》更是立场鲜明地将日本的行为定义为“吞并”(annexation)^⑦。这些报道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同时激发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

从一·二八事变到1932年5月中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个阶段。由于一·二八事变让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保守派三缄其口,这一时期美国各大媒体对日本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究其原因,其一,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65%以上都集中在上海。上海局势引发列强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日本入侵上海显然激起了民愤,媒体纷纷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恶劣行径。其二,“伪满洲国”的成立意味着日本决心否定华盛顿体制,也就是说,日本决心否定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这必然引起美国的戒备和厌恶。其三,从事变开始以来日军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包括进犯锦州、齐齐哈尔和上海以及成立“伪满洲国”,使媒体已逐渐明辨日本的侵略意图,因此发出了较为统一的声音。政府也希望动员起舆论的力

①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6.P88.

②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第1卷》,张玮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The Far East*: 1931.<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id=FRUS.FRUS1931v03>.

④Hallett Abend. *Japan is extending sphere of interest*. *The New York Times*, 1932-01-31(E8).

⑤Hallett Abend. 600 Japanese rule Manchoukuo regime. *The New York Times*, 1932-04-27(6).

⑥Hallett Abend. *Japan seeking hold on Chinese eastern*. *The New York Times*, 1932-05-22(14).

⑦Hallett Abend. *Japan puts troops below Great Wall*. *The New York Times*, 1932-08-07(12).

量,从而对日本产生威慑。事实上,《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也确实使美国国内排日情绪达到一个新高度,各种反日组织纷纷成立,还出现了抵制日货运动。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出于保护侨民的考虑和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担心,也采取了适当的手段,一方面联合英国多次向日本提出抗议,一方面开始向上海派遣军舰。这一过程正说明媒体的报道形成了反日舆论,舆论又作用于政府,使得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总的来说,在19世纪30年代初,美日两国矛盾还未成为焦点,美国在华利益还未遭受到日本的重创。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舆论在一系列涉及远东的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尽管前后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军事准备远未就绪,加上欧洲局势动荡,美国一时还无法采取实际行动。但是美国人毕竟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远东了。就像伊罗生在其“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正是得益于《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集中报道,美国公众从1931年开始严肃意识到亚洲和中国问题^①。

三 七七事变时期《纽约时报》超越政府的声音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一部借口士兵失踪,与驻守宛平县的中国守军在卢沟桥附近发生冲突,是为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此全面升级。与九一八事变相比,七七事变的性质和影响较为清晰,而且后续动作频频。鉴于日军的野蛮行径和对美国利益的触动,关于远东危机的报道纷纷登上这一年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形成了一个个热点。检索发现,1937年《纽约时报》共有413篇远东报道,后续的1938年也有169篇。通过对这一时期《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随着远东局势的恶化,美国媒体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冲突本身及其给中日两国带来的影响,而是更关注对美国自身利益构成的冲击

与挑战,主要围绕聚焦美国在华战略核心利益、关注海外国民生命财产安全、揭示日军反人类暴行这三个方面展开报道。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媒体还普遍乐观地认为,日本对华侵略行为不会使美国遭受多大损失。但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开始大举进攻华北,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了直接威胁。尤其是上海等地为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区域,此举无疑击中了他们的痛点。媒体开始意识到,美国要保住自身的战略利益,仅仅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够的,袖手旁观无异于助纣为虐。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美国在华利益受到进一步冲击。有关淞沪会战的报道多次登上《纽约时报》头版,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日本的野蛮行径给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带来的深重灾难。8月3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日本人承诺“目前”不会轰炸平民》一文,聚焦于日本针对上海南陶平民的轰炸,并借日本发言人之口暗示上海前景堪忧:“日本发言人证实了今后类似于南陶的轰炸可能是必须的。……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政府还表示将不会对国际租界和使馆区的轰炸承担任何责任。”^②

除了表示担忧,《纽约时报》也开始谴责美国的对日政策,斥责美国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1937年10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前国务卿史汀生的一封信,信中有道:“非常可悲的事情是,目前美国和英国正在援助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英美向日本出口各种用于战争的物资),而这些援助对日本是如此的有效和关键,以致于假如没有这些援助的话,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很可能早就被迫停止了。”^③

此时美国国内正为是否在中日冲突中援引中立法而争论不休。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中立法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及和平主义思潮的产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孤立主义者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总统援引中立法。对此《纽约时报》坚决表示反对,理由是“援引中立法反而会导致不中立的结果”,中日海军力量相差悬殊,“现款自运”的原则无疑有利于日

①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21页。

②Hallett Abend. *Japanese promise not to bomb civilian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New York Times*, 1937-08-31(1).

③Henry L. Stimson. *Letter to the editor, Cooperation to Help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0-07(16).

本,不利于中国^①。

对于布鲁塞尔会议,《纽约时报》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认为会议通过的宣言只是一曲“天鹅挽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没有在援助中国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相反却让美国示弱于日本,事实上对集体安全的概念造成了损害^②。

日本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不但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导致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随着美国传教士被杀、驻华使馆人员被殴伤的消息不断传出,再加上日本采取海关封锁、汇兑统治、限制禁运等措施,导致美国在华势力受到不断排挤,引起了媒体对日本的一致声讨,《纽约时报》对日本危害在华美国侨民、破坏中国海关完整、在占领区内干扰美国的条约利益进行了多次抗议。1937年8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些美国妇女和儿童因中日之间的战争,被困在上海近郊的一个小村庄里^③。美国媒体对有无必要撤回在华侨民、企业和军事力量展开了激烈争论。对此《纽约时报》态度坚决,认为美国的兵力应该继续留在中国,给在华人士和企业提供足够的保护。美国人民所希望的和平绝不是依靠一味地逃避威胁便可得来^④。《纽约时报》认为日本的侵略不仅给美国的对华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美国对华贸易的损失总额已经高达2.25亿美元之多”,而且日方还开始全面打压美国侨民——“日本甚至连让第三方国民返回这些地区进行生活与贸易的间接责任也不愿意承担”^⑤。其放肆的行径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美国的价值标准,日本是在践踏美国人所珍视的自由和平等贸易等核心价值观。

此后发生的“帕奈号”事件更是让美国民众群情激愤。1937年12月12日,美国的“帕奈号”炮舰在长江上被日军击沉,导致美国水兵死亡2

人,重伤11人,另有侨民1人死亡。美国舆论对此一片哗然,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打击日本。《纽约时报》也对日本进行了强烈谴责,要求政府停止对日贸易,并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⑥。

除了与美国自身利益的有关事项外,《纽约时报》还发出了正义的呼声。12月18日,记者蒂尔曼·德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平民的尸体遍布所有街巷,……死者很多是被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记者在十五日这天的12小时中,就曾三次目击俘虏被集体屠杀。”^⑦德丁以鲜活的图片和文字,展示了日军的血腥暴行,激发了美国民众对日军的强烈愤慨。

在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美国记者也展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敬佩。比如1937年12月1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头版上有关日本进攻南京的报道,描述了有关中国军队英勇不屈的内容,显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的认可和钦佩。“中国的普通士兵又一次在南京显示了勇气,那是一种让大部分人感到绝望的情况下遭受猛攻却坚守一线的勇气,虽然大部分人没有军饷,营养不良,也没有任何的伤员给养,中国军队却能让日本人在占领城门周边每寸土地时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⑧这种措辞建构了《纽约时报》对中国人民同情和佩服的整体话语基调,并醒目地强化着读者的认知。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成了1937年美国新闻的焦点——该年度就影响美国人最大的事件进行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亥俄水灾排在第一,紧随其后的就是中日战争^⑨。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日本企图独吞中国的举动,既对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远东秩序构成严峻挑战,也变相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冷酷的事实使美日矛盾日趋尖

①Hanson W. Baldwin. *Neutrality Plan Upheld*. *The New York Times*, 1937-09-25(33).

②Duffus R L. *Parallel Roads to Peace*.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2-24(24).

③Hallett Abend. *U.S. holds troops in Shanghai ample*. *The New York Times*, 1937-08-12(15).

④UP. *Toward Stability in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1937-07-28(27).

⑤Hallett Abend. *Chaos in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2-14(36).

⑥AP. *All Captives Slain*.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2-12(1).

⑦Tillman Durdin F. *Butchery Marked Capture of Nanking*.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2-18(1).

⑧Hallett Abend. *Nanking invested*.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2-13(1).

⑨George H.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1).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P72.

锐。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报道超越了政府的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纽约时报》对七七事变的报道和评论都趋于冷静、理性、深刻、成熟,对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坚信不疑,并将日本明确定义为一个侵略者,从各个方面对其行径予以否定性分析,在舆论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强大压力。再则,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弥漫着浓厚的孤立主义情绪,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强。《纽约时报》积极报道中日冲突,评论日本侵华的危害性,教育了孤立主义者,从而给予美国政府更大的外交行动空间,使政府可以有限地讨论和参与对日本采取战争以外的威慑措施。最后,《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不忘抓住机会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甚至不乏对政府的批评,指出远东局势的重要性,敦促美国采取抑日援华行动,并推动美国政府重新制定远东政策。

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战争是改变远东局势的关键事件。《纽约时报》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代表,在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中,对中日双方的态度比较审慎,经历了一个从冷眼旁观到适度介入的过程。但总体来说,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容忍成分

居多,未能意识到其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显然,这一时期《纽约时报》尚未深刻理解中日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报道节奏多跟从于政府的反应。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一系列对峙冲突,到七七事变时,《纽约时报》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把握远东政治格局的演变,也强烈感受到了日本所作所为对美国在华乃至远东利益构成的威胁,因此其态度也由中立转变为有所倾向,对日本不断进行的军事活动施加了较大的舆论压力。这一时期的报道力度有所加大,态度逐渐鲜明,对推动政府的远东政策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通过《纽约时报》对中日冲突两次事件报道的前后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媒体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语境,已从期待日本自我约束逐渐向抑日援华的方向转换。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国家形象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主要取决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包括美国大众和政府在内的对中国进行强大支援的历史潮流,甚至美国最终选择支持蒋介石政府,也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塑造具有某种深刻的历史关联。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o the Liukouchiao Incident

YAN Jin^{1,2} & XIONG Pei-biao¹

(1.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and the Liukouchiao Incident were the two important incidents of the 1930s in Sino-Japanese conflicts, which drew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 media represen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During the two incidents, the stand of *The New York Times*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newspaper'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has changed from apathy to sympathy, while its attitude towards Japan has changed from connivance to condemn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context about Sino-Japanese conflicts gradually developed with a tendency of suppressing Japan and aiding China, which laid the public opinion basis for the conversion of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ies.

Key words: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Liukouchiao Incident; *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校对 蒋云霞)